



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中国
1979 - 2009
互助合作三十年

封面照片：

被安置在云南的华裔越南难民烹调WFP的援粮

CHA_198412_WFP-Unknown_0001

目录页照片：

中国通过WFP向津巴布韦捐赠的玉米粉

ZIM_200901_WFP-Richard_Lee_0013

© 版权所有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2009年

保留所有权利。本出版物所载信息可自由复制，但需注明出处。

如中文翻译版与英文版之间存在任何冲突，以英文版为准。

声明

所有地图显示的边界及名称，并不表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对任何领土的法律地位的判断，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如需垂询请联络

北京亮马河南路2号

联合国大楼

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

电邮: wfp.beijing@wfp.org

电话: +86 10 85325228

传真: +86 10 6532 4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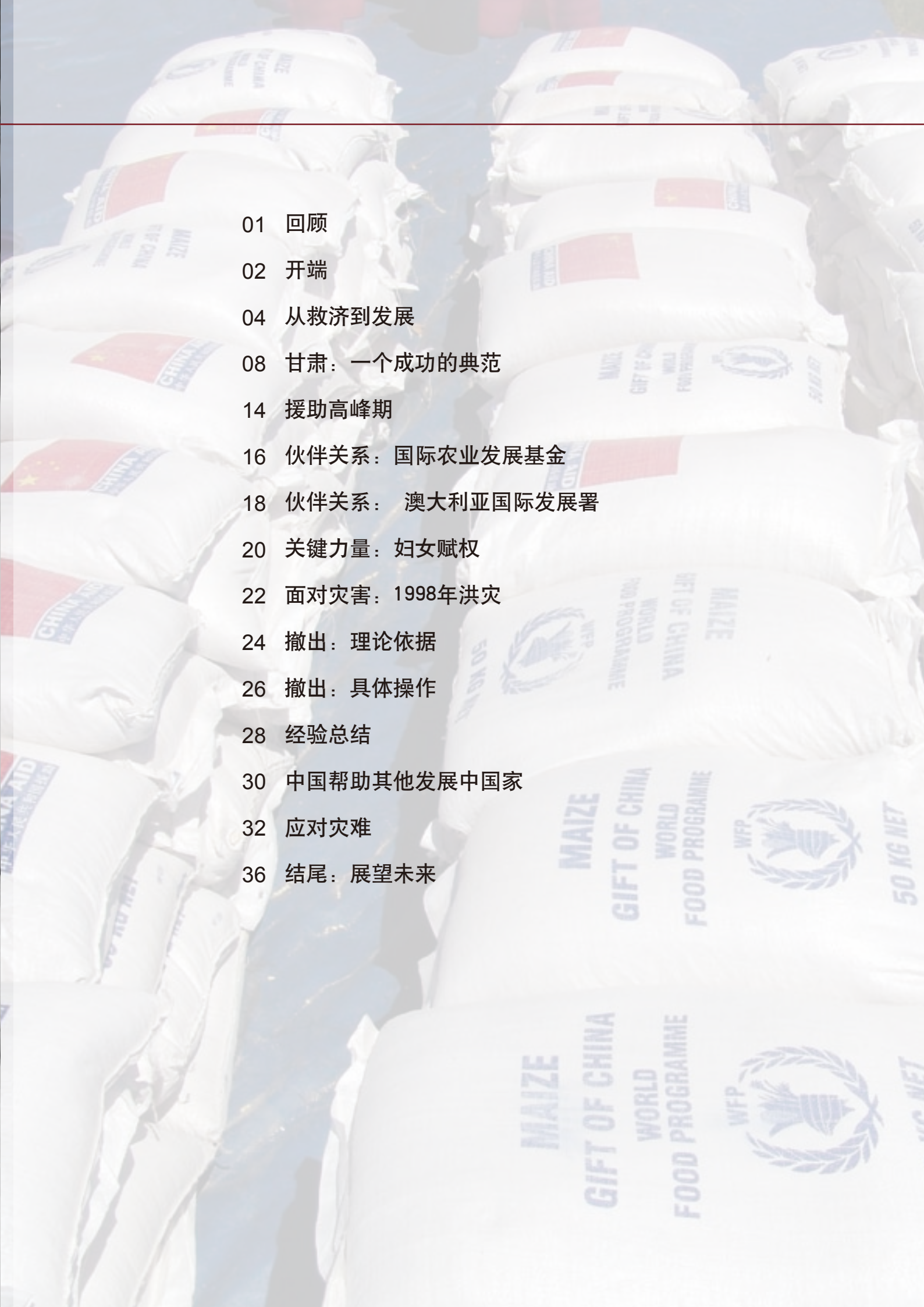
网址: www.wfp.org.cn

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中国

1979 - 2009
互助合作三十年

目录



- 
- 01 回顾
- 02 开端
- 04 从救济到发展
- 08 甘肃：一个成功的典范
- 14 援助高峰期
- 16 伙伴关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18 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 20 关键力量：妇女赋权
- 22 面对灾害：1998年洪灾
- 24 撤出：理论依据
- 26 撤出：具体操作
- 28 经验总结
- 30 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 32 应对灾难
- 36 结尾：展望未来



中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林琳2007年访问MekeleWFP学校供餐项目，并品尝中国捐赠的营养餐



ETH_200712_BIN_Fengli_Yuan_0013

1979-2009: 互助合作三十年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1979年建立的伙伴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间，从起初的以粮食援助为手段提供救济，不断延伸并实现了转型。WFP 和中国政府一道帮助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多是偏远地区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告别了绝对贫困。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粮食自给的实现，中国逐渐从WFP受援国转变为捐助国。如今WFP和中国政府相互协作，共同为世界各地数千万贫困人口提供粮食援助，为“消除全球饥饿”这一千年发展目标而努力。

华裔越南难民被安置在海南农场劳动



开端

在互助合作这30年里，WFP在华共实施了70多个项目，捐赠了近四百万吨粮食，惠及三千万人，遍及除港、澳、台之外的每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通过开垦荒地、灌溉和基础设施建设，使荒山成为良田。以工代赈活动帮助各个社区靠稀少的耕地实现了自给；关注妇女作用的以粮代教活动帮助项目区所有的村民，不分男女，发挥自己的潜能。

WFP和中国目前良好的关系是从尝试性的合作开始发展而成的。虽然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78年中国迅速对外开放和进行改革之前，中国政府并未寻求国际援助。

1979年，大约25.2万难民逃亡到中国的南部省份，大部分是华裔越南公民。难民的涌入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愿意同

联合国机构合作，并向WFP表示欢迎粮食援助，以帮助安置这些难民。

由WFP当时的代理执行干事昂贝尔·纳阿泽·维多布里托率领的一个项目规划团和中方官员协商达成一致：将难民从最初被派遣从事的劳力密集项目转移到位于热带的海南岛上和云南省的国营



华裔越南难民等待领取粮食援助



WFP早期受益人



WFP驻华代表处外景

农场。难民从事扩建农场、修筑水坝、水闸和灌溉水渠的劳动，粮食援助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发放给他们。这是双方第一个合作项目。

这个成功的开端使中国政府欢迎WFP为日后的发展提供支持。中国政府意识到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1978年约为2.5亿人）脱贫和发展粮食生产方面，WFP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WFP认同中国避免依赖国际粮食援助的愿望，进入中国的目标乃是帮助该国实现粮食自给。

1981年9月，WFP在北京设立了常驻机构。一支四个人的小团队——一名国际官员和三名中国当地雇员——在位于三里屯使馆区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院里设立了WFP驻华代表处。直到30年后的今天后，WFP中国办公室仍在此地。

在北京设立WFP驻华代表处

“一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的包装箱上，因为没有桌和椅。终于，我们从香港订购了家具和文具，弄到了一台手动打字机。我们开始装饰办公室。那时，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可不像今天——中国刚刚开始向外部世界敞开大门，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学起。”

—— 龚建英 项目官员
时任WFP驻华代表处行政秘书

陕西米脂县农民领粮食回家



从救济到发展

WFP援助中国的发展项目最初侧重于农业、林业以及渔业经济，并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一部分项目。为了满足对奶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1983年WFP启动了“六大城市及周边乳业开发”项目。六年内，该项目达到了预定目标，使六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和西安的奶制品产量翻了一番。



六大城市及周边乳业发展——武汉奶牛场

诸如此类的早期项目为一些地方企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如建立了瓶装水和酸奶工厂。这些企业后来被转交给私营部门，运转至今。

然而，对一个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而言，WFP和中国之间就发展项目的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系列迅速的变化，包括实施了改变农村面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第一次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到耕地的使用权。政府逐步放松对农产品销售的监管，农户可以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

随着农民逐渐参与到一个越来越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力并实施大型农业项目。中国农业生产开始显著增长的同时，WFP在中国的发展中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WFP开始从事发展援助的时候，中国农民的收入出现了惊人的增长——1978年至1984年，年平均增长率达15个百分点。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这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80年代初，随着WFP援助中国项目的扩大以及双方合作的加深，中国政府鼓励更多的省份独立编写项目建议书提交给WFP的理事机构审议。由于WFP的项目稳步增加，驻华代表处雇佣了更多的国际和中国职员。

与WFP的早期合作中，改革的势头与中国政府卓有成效的项目实施战略是一个制胜的组合。这一卓有成效的模式使WFP项目作为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伙伴关系的成功典范获得了国际认同。

■ 重点西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其他地区的紧急需要给有限的援助资源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国际捐助组织和国家开始重新审视WFP对中国的援助。在这个困难的国际背景下，WFP执行干事詹姆斯·英格拉姆于1986年4月访问北京。访问后，英格拉姆重申WFP援助中国的承诺，声明粮食援助对中国人民十分有益和重要，而且肯定中国政府对项目的实施是高效率的。

尽管如此，WFP认同中国政府对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切，决定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区转移，不再着眼于为城市居民的饮食开辟多样化的蛋白质来源，而是集中精力帮助落后的欠发达内陆地区。



山西米脂以工代赈农民在劳动现场用餐



加拿大援助方代表到甘肃参观项目实施

重心西迁的决定

“从中国相对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向最贫困、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转移，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项目的技术质量。评估团更多的时间花在实地考察中，把技术讨论和汇报放在各省项目区。我们在实地监测中引入个案研究。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我们在评估小组中加上了一名人类学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了解土地改良项目的施工人员和受益者的情况。我们在工作扩展的同时，至关重要是保持捐助者对我们的信任。因此，我们定期组织捐助国代表到实地访问，有些是直接从捐助国首都远道而来的高级官员。”

——特雷·佩奇 WFP驻华代表

1986—1990年



陕西受益家庭享用WFP援粮

接下来的几年，边远干旱地区成为WFP的重点援助对象。虽然在地形、气候和地理位置方面遇到了严峻的挑战，WFP通过以工代赈活动援建的灌溉系统遍布整个地区，逐步增强了粮食安全，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灌溉水渠竣工后，自行车和缝纫机开始出现，体面的服装取代了孩子原本褴褛的衣着，破旧的住宅被修复或重建。几年之内，电视天线开始出现在一度荒凉的乡下。

■ WFP援助项目在西部地区的实施

随着中国的视角更加全球化，WFP团队在农村的活动让这些偏远角落也接触到了新思维。WFP的评估团成员往往是所到之处第一批到访的外国人。有时WFP工作人员会受到外交官规格的接待。在乡下，盛大的欢迎人群迎接WFP工作组的到来，并为他们在当地体育场馆举行歌舞表演。

有的地方政府因为觉得原来的住处不适合接待外宾，甚至为工作组新建了专门的住处。



WFP项目官员珍·布朗在河北种下友谊树

作为WFP对中国援助的主要物资，小麦被整批运送到就近项目区的港口。WFP通过一个巧妙的办法避开中国辽阔的版图带来的运输困难——海外运来的粮食被存入中国政府的粮库，作为交换，再从项目区的谷仓调拨同等数量质量的小麦、面粉或者大米。

也有一些援粮通过铁路从港口运输到距项目最近的卸货终点，然后用汽车运到项目区的粮仓。WFP的援助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使其能够节省有限的资源用于改善这些落后地区的教育、保健和卫生状况。

WFP提供的援助帮助全国各地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家庭满足了口粮之需，还帮助他们积累了可持续的家庭资产。一些支持教育和保健的WFP项目更使贫困家庭长久受益。

以粮代教鼓励全家人，特别是女性成员，参加功能性扫盲和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粮食和培训的结合更加激励了农户投身WFP项目的热情，提高了土地平整和灌溉水渠建设的质量。此外，WFP项目也帮助农户开发多样化农产品和从事其他副业。



广西少数民族妇女参加卫生知识培训



甘肃：一个成功的典范

甘肃省年均降雨量低，天气条件恶劣，历来是粮食自给最困难的省份之一。位于西北地区的甘肃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虽然地处黄河上游，甘肃却是全国旱情最重的地区。在WFP的援助下，甘肃农民修建了黄河引水灌溉系统，使原本有时食不果腹的人们生活得到了改善。

WFP的援助覆盖了甘肃省旱情频发的定西南部以及中部降雨量最低的金台和古兰县。这一地区虽然气候恶劣但土地肥沃且平坦。然而，当地农民备受贫穷和低产的拖累，部分原因是政府财力有限，对平整农田、发展养殖场、家庭供水、造林活动的资金投入不足。

为利用大约50公里以外的丰富的黄河资源，甘肃省政府1984年发起了一个补给缺水地区的引黄工程。

但这一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搁浅。省政府申请WFP援助以完成这一未竟项目。“甘肃省景泰川控制区灌溉农业开发”项目获得批准，通过灌溉土地和植树造林扶助当地农业发展。此外，WFP设计人员还着手为11.5万迁徙到项目区的移民兴建上万所住宅，并为他们重建了100所学校、几十个村诊所和乡镇卫生院。



甘肃发粮现场

该项目收效十分显著，农民原本在这片土地上难以为生，到1995年项目竣工之前，当地粮食产量比1989年增长了638个百分点，而且人均收入提高到642元人民币，大大超过项目最初的估计。

甘肃的环境及改善

“甘肃省条件最恶劣的是饱受旱情之苦的定西南部。我访问那里发现饮用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地农民发明了一种蓄水池，用它收集的雨水可以用一整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下，我们帮农民挖了蓄水池。这解决了饮水和粮食的问题，帮了大忙。”

—— 何康 中国农业部前部长1983-1990年



甘肃会宁饮水系统

保持对甘肃的发展援助

在2001至2005年的中国国别规划中，甘肃省仍旧是WFP发展援助的一个重点省份。WFP通过粮食增产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实施战略帮助当地消除贫困。

跟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工代赈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被应用在甘肃的减贫工作中。农民退耕还林、改良土地、修建灌溉水渠和饮水设施，并得到粮食作为酬劳。以粮代教活动伴随这些工程开

展，主要目标集中在帮助居民，特别是妇女，改善健康状况，提高农业技能、识字能力和从事创收型副业的能力。

以下这组数据展现了WFP甘肃项目的丰硕成果：

粮食受益人	936,177 (女姓占48%)
以工代赈参与者	221,732 (女姓占50%)
以粮助训参与者	418,175 (女姓占61%)
修建饮用水蓄水池	11,901个
修建饮水系统	51个
修建灌溉蓄水池	5,336个
修建拦水坝	106个
开梯田	1,594 公顷
草地、经济作物、柴火和水源涵养林	5,446 公顷
乡村道路建设	61 公里

(数据截至2005年5月)



甘肃礼县饮用水项目



甘肃会宁县王集小学

困扰甘肃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地在册小学生总数很少。2004年WFP在甘肃省进行的调查显示，甘肃小学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并且出勤率普遍较低，特别是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童而言。一些地区女童入学率只有30%。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

- 一、贫困家庭无力负担每学期40元人民币的学费；
- 二、儿童要承担农活和家务劳动；
- 三、传统观念认为女童受教育不如男孩重要；
- 四、学校离家远；
- 五、教育质量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WFP从农村综合发展项目调配了400多吨粮食，加上由国际物流公司TNT集团捐赠的粮食，在甘肃省启动了一个学校供餐项目。共有9,420名女学生领到了口粮以鼓励他们的父母让女儿继续接受教育。



2004年6月20日，WFP与TNT组织了一次“行走天地间”活动，惠普、甲骨文、澳大利亚CBN电视频道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出席了这一私营企业颁奖晚宴，为学校供餐项目筹资。2005年，WFP用募得的捐款购买的粮食使甘肃另外2,500名辍学女童重返校园。



领到口粮的甘肃女生

■ 加强对艾滋病的认识

甘肃也是WFP将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其以粮代教项目的典型。这是2001年WFP开始在培训项目中增添的一个新内容。WFP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密切合作，得到关于培训的教材和课程的建设性意见。由于能够深入到中国偏远的农村地区，WFP获得了帮助防止病毒传播的特殊机会。

在2003年发表的一份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护理的联合评估报告中，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问题工作组确定了以下可能导致艾滋病大规模流行的潜在因素：

- 高风险行为的增加；
- 对艾滋病缺乏认识和存在社会歧视；
- 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高发病率；
- 农村治疗中心进行的输血；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



据甘肃省卫生局2005年5月提供的数据，147例新增艾滋病病例中一半是女性患者。WFP帮助开展培训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介绍病毒传染方式的知识。甘肃大约有40万农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妇女，接受了这种培训。

2004年中国艾滋病病例报告



□ 省界线

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本地图上显示的边界及名称，并未得到联合国的核准或认可。

甘肃受益群众





援助高峰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认捐国通过WFP向中国提供小麦的数量达到峰值。1986年至1988年，中国平均每年得到WFP40万吨的发展援助粮食，是当时WFP全球最大的项目，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援助增长使WFP支持的项目数量创下纪录，惠及越来越多的受益者。

对中国的粮食捐赠激增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包括：

- WFP在进行发展援助和紧急救济工作中的高效表现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肯定，认捐国对WFP越来越信任；
- 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并认可中国政府解决国内贫困问题的努力；
- 当时国际粮库中有丰富的储备，中国实施项目的效率使得大量的粮食可以被用来帮助边远地区的贫困人口。

WFP开始越来越多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并共同努力更好地配置国际援助资源。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新的理念被引进到WFP的项目，其中包括：

- 强化评估程序；
- 在考察团中增加社会学家，以便更好地评价项目对社会的影响；
- 更详细的了解受益人情况。

这种种变化使WFP更好地了解了单个项目的利弊，以及执行单位的强项和弱项。

此外，中国经济权力日益下放也对WFP在全国各地的工作产生了影响。

权力下放后的变化

“随着农业部开始将权力逐渐下放到省一级，我们的关系也在不断演进。我到任的时候，操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项目建议书从各省直接上报给我们，我们进行修改或者重新设计以适合规范，然后再把建议书送回各省。但随着各省开始支付更多（项目执行费用），我们开始跟省里，而不是中央政府，进行磋商。”

——托马斯·莱卡托 WFP驻华代表处
项目官员1987-1991年



■ 高峰年的一个典型项目

高峰年的一个典型项目	安徽省改造排水和灌溉设施发展农业项目
地点	安徽省
受益人	401,400
WFP粮食总量	35,000 吨
项目总价值	约4,750万美元, 其中 1,500万美元来自世界银行
项目始于	1984年4月1日, 为期3 年

背景：项目区位于中国北方平原，其适度的降水、日照、温暖的气候和长期无霜期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该地区长期受两种气候交替的影响，导致季风气候——雨量不均，旱灾、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频发。土壤贫瘠也阻碍了农业生产。

目标：主要目标是通过改善排水和灌溉系统提高农业产量。这包括开凿排水系统，建设和修复灌溉水井，平整土地，道路建设，植树和修建乡村道路。项目近期目标是控制和消除洪水、水浸和干旱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项目区：淮河平原沿线的安徽北部，包括蒙城、涡阳和遂溪县。

受益者：该项目覆盖40多万人，包括10.32万直接参与劳动者，其中妇女占31 %。

活动：整个项目中WFP的援助增加了粮食供应，减轻了农民经济负担，鼓励农民更加积极参与建设活动，从而加快工程的实施并提高了工程质量。工程实际完成了一个排水系统和一个灌溉系统，还有数座桥梁、道路、水闸以及在地区范围内重新造林。





伙伴关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90年代粮食援助的形势出现了转折。捐助国更加重视紧急救援，提供给WFP进行发展援助的资源明显减少。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资源的作用，WFP在90年代中期开始在华联合投资，进行农业资源开发。

自1993年起，WFP和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就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国际要求联合国机构协调各自项目周期的呼声很高，而且WFP和IFAD总部都设在罗马，两者在项目实施地缔结伙伴关系顺理成章。1995年，WFP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也包括了IFAD——WFP和IFAD共同资助一些项目，并有中国农村信用社参与进来。IFAD逐渐发展成为WFP在华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这两个机构目标一致——都是减轻农村贫困和提高家庭粮食安全。然而，IFAD不同于WFP之处在

于它是通过提供贷款帮助发展中国家，让受益人从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养殖和其他创收活动。

除了改善贫困人口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这一主要活动，IFAD项目的做法还包括：

- 更好的聚焦乡镇；
- 各村更深入的参与项目规划和实施；
- 具体的社会和创收技能培训；
- 着眼性别，解决女性和男性的不同需要。

WFP和IFAD在中国的伙伴关系具体包括：

- 共同的愿景：摆脱贫困的路线图——首先满足家庭基本消费需求，然后实现家庭粮食安全，并最终改善其获得小额信贷的机会以进行创收和维持生计；
- 共同与政府对口部门，即农业部接触；
- 以及通过WFP的“脆弱性分析和制图系统”

实现对贫困县乡——主要是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定位扶助。

互惠的联盟

“IFAD通过小额信贷所做的跟WFP的工作十分类似。WFP的粮食援助可以惠及最穷的人，但小额贷款不能。因此IFAD的压力是如何做到这一点。IFAD的兴趣在于更精准的覆盖特定人群。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认为IFAD的投资利于项目的长期效果。合作的想法来自IFAD和WFP之间的讨论。通常情况下，政府尽力让我们各司其职，但是联手IFAD，我们可以减少投资却实现相同的目标。小额信贷和发展援助结合可以做更多事情。WFP可以补贴个人，使他们能够从农发基金的小额信贷服务中获益。”

——克里斯·泽文斯基
WFP驻华副代表1994-1998年

两个机构的联合使对抗贫困的手段更加有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明确的效果。WFP和IFAD的双重投入使国际援助可以惠及那些刚脱离贫困的人口，帮助他们受益于小额信贷和启动创收项目。

从中国的角度，WFP和IFAD之间的协作是受欢迎的。合作项目融合援款和贷款资金，使海外援助资源翻了一番，减少政府接受IFAD贷款的风险。当然，这也减轻了单独项目的规划和汇报的工作量以及接待认捐方项目考察团的负担。这种伙伴关系也减少对国际顾问的依赖，从而加强了中国自身准备和制定项目的能力。

两个机构和中国的协力优势对提高项目整体效果发生了显著作用。WFP和农发基金在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成为一个样板，后来被推广和应用到这两个机构所在的其他几个国家。

WFP/IFAD合作项目案例

项目名称	安徽省西南山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地点	安徽
受益人	43.6万（65%为女性）
WFP粮食	14,000吨
项目总价值	约5,600万美金，其中2,650万美金来自农发基金
项目始于	1999年1月1日，为期5年

内容提要：这个WFP/IFAD合资项目位于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目标是教育和培训贫困家庭的妇女。WFP的粮食援助和IFAD贷款投资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模式：IFAD为小额信贷的受益者提供技术培训，而WFP则提供粮食支持。

目标：这个项目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农业和社会综合发展实现粮食安全，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并以可持续的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短期目标是：1）增加作物产量；2）促进和增加获得信贷的机会；3）向农民创收活动提供信贷以增加家庭现金收入；4）通过农村公路建设，加强对外通讯和市场可及性；5）改善农民技能和提高其自给能力；6）改善目标人口的健康状况。

项目区：包括金寨、霍山、岳西、潜山和太湖五个县的34个乡镇，共438村。

受益人：10万多户，约43.6万人。

活动：WFP的援助用于支持以粮代教方案，包括水资源管理、作物培育、植树、畜牧和渔业的技术培训，以及妇女扫盲、创收技能发展和基本保健的培训。还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建设饮水系统。





澳发署资助的贵州学校饮水工程

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上世纪90年代，WFP驻华代表处与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澳发署）建立了伙伴关系，该署开始将大量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预算通过WFP实施。

澳发署致力于帮助中国解决重大的健康、环境和行政管理问题。澳发署协助政策改革、区域贸易和投资的同时，还关注社会问题。它跟WFP共同关心改善卫生系统，减少如艾滋病之类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和加强水资源管理。



创造性的联盟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在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实干角色。这是一个愿意承担风险富有创造性的捐助者，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人们十分需要小额资本，因为当时跨越银行规定、利率和其他限制获得个人贷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澳发署而言，将WFP作为一个金融渠道还是有点不寻常，因此，我们研究和借鉴了我和IFAD合作项目的成功模式。他们说：“咱们把你们分发粮食和我们支付现金的能力联合起来，就可以开发以现金助工和以工代赈的项目供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理查德·里根
WFP驻华副代表1998-2000年

■ WFP/澳发署合作项目案例

项目名称	武陵山区农村发展项目
地点	贵州省
受益人	190,000户
项目总价值	约1,300万美元，澳发署负担50 %
项目始于	2000年4月17日，为期3年

目标：该WFP/澳发署这一合作项目旨在改善项目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减少贫困。项目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包括：

- 1) 建设农村公路；
- 2) 提供安全饮水设施；
- 3) 建造和翻修诊所和医院。

项目面积：贵州省西南部的黔东南州七个县。

受益者：约19万少数民族农户。

活动：该项目为劳力密集型，依靠受益人本人的积极参与。主要活动包括修建道路、水井及澄清池和医疗保健设施，以及提供培训。附加的医疗培训部分包括保健人员培训、审核培训教材、提供基本药品和医疗设备、村民基本健康和卫生培训。

WFP的主要援助可归纳如下：

- 修建6段总长度为88公里的四级公路；
- 建造4个大型机井；
- 修复1,871口水井以及开凿547个澄清池；
- 建立8个乡镇卫生院和186个村诊所并提供医疗设备和药品；
- 为约10万村民提供包括艾滋病知识的基本卫



贵州少数民族参加艾滋病知识培训

生保健的培训、为384个诊所的工作人员开展卫生培训；

- 为38名教师和1万名失学儿童进行性教育和艾滋病意识培训。



关键力量：妇女赋权

尽管毛泽东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WFP在援助工作中将这一理想转化为现实仍然遇到了不断的挑战。使妇女不仅在以工代赈项目工地上操作手推车，也能在项目管理和决策中占应有的一席之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妇女参与

“我从可行性研究和准备到启动全程参与过一个项目，因此有机会就妇女全面参与项目事宜，跟地方项目办和领导小组对话。尽管毛泽东曾提醒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当时设计和运行项目的还是男人，妇女不受重视。虽然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就妇女参与项目和加入管理办公室问题开始了对话。”

——艾伦·威尔金森 WFP驻华副代表
1992-1994年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帮助WFP将战略重点进一步集中到对抗贫困中的性别问题。这一问题随着1992年WFP第一位女性执行干事凯瑟琳·贝尔蒂尼的任命已经受到特别的重视。一系列注重性别和通过培训加强妇女技能的项目越来越反映出中国国别规划的这一优先考虑。

女性效应

“我认为——这不是自我吹嘘——我作为WFP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国家代表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农业部把更多女性安排到对口职位上和项目管理办公室。我们倡导更多的妇女走上管理职位，这一点能够实现，除了因为这是WFP对妇女承诺的一部分，也因为政府是在跟WFP的一个女性国家代表打交道。办公室有空缺时，我们委任了几位女性，甚至任命了一名中国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性别问题和对妇女的承诺。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扭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埃尔斯·拉森 WFP驻华代表1997-2000年

拉森代表WFP与农业部签署协议



以粮代教的资助模式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得以从每日固定的农耕中抽出时间参加扫盲班。女学员很快获得了技能、信心和自尊，学会书写基本的字词、签名和理解简单的合同，这使她们能够受益于小额信贷贷款。

功能性扫盲培训课程提供生活所需知识和技能，是激励和赋予妇女权力富有成效的途径。培训除了关注营养、卫生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实际技能，也侧重于阅读、写作、简单的数学计算。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 易懂的信息；
- 关注当地需要；
- 最大限度地利用照片和图形；
- 鼓励学生参与，激发学习兴趣；
- 瞄准作为目标群体的成年女性所关注的优先事项。

WFP通过制定具体目标巩固其提高妇女地位的承诺，跟全国妇联的紧密合作也为项目的成功提供了帮助。此外，WFP升级了其受众定位和执行监测系统的性别敏感度，反映了对妇女需要的重视。

然而，更加重视妇女和性别问题也招致了一些异议——有些人认为新的战略实际上增加了妇女的负担。

主张重视性别问题的人则指出，WFP项目在有些地区和农村为男性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使女性受益。为了养家糊口，农村男性每年不得不进城一段时间打工赚钱。通过提高生产率和促进本地创收活动，WFP帮助他们缩短了背井离乡的时间。通过支持妇女的扫盲培训、保健、营养和创收活动，妇女对家庭的贡献得以加强。2002年1月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研究结论认为，在向中国妇女直接提供粮食援助、促进其在决策中的作用并提高她们的发展能力方面WFP是成功的。



贵州妇女参加创收技能培训

1998年洪灾后以工代赈重建现场



面对灾害：1998年洪水

长江主航道和中国各地其他主要水系容易泛滥成灾。1998年春，连续的暴雨导致自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长江沿线的中部和南部损失严重。根据官方估计，超过3,000人丧生，1,380万人被疏散，近500万户家庭被毁，1,500万农民失去了庄稼。洪水还破坏了大量的保健诊所、学校、供水设施以及道路、桥梁和工厂。

面对灾难，中国政府部署部队协助救援工作，启动了自己的紧急救援措施，并首次代表灾民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

WFP积极响应这一呼吁，启动了“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省洪水受灾地区紧急粮食援助”项目，为这四个灾情最重省份的灾民提供粮食。为完成援助这些地区的任务，该项目分为一个月的紧急救济阶段和接下来三个月的以工代赈和重建阶段。

抗洪压力

“我还记得我在WFP开始工作的确切日期。那个盛夏我刚刚进入（WFP）亚太局，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我信箱里的唯一一封信，是来自中国政府的提供水灾紧急援助的请求。亚太局局长注明：准备回信。那是我第一天的工作，回信可不容易。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毫无疑问，这次特大洪涝灾害给中国政府相当大的挑战。这是政府第一次正式要求国际紧急援助。”

——拉斯姆斯·依根代尔 WFP项目协调员

1998–2000年

设在湖南澧县一家酒店的临时办公室负责指挥湖南和湖北省的救援工作。在这间紧急援助办事处运转的86天中，9名工作人员，包括6位粮食监督员，只有基本的设备进行工作：3个笔记本电脑、3台打印机、1部座机和2个移动电话。他们驾驶着3辆租来的车跑了1.5万公里的路程。尽管资源有限，他们在灾区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援助实地执行的时机充满了艰巨的挑战，WFP的反应异常迅速，帮助政府解决临时居住点的紧急口粮需求以及恢复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受灾群众领取赈灾口粮

超过570万人领到每日1斤大米的配给。在第二阶段的行动中，受益农民参加了诸如重建饮用水设施和土地清理的以工代赈活动。整个项目总投入1.46亿美元，其中WFP捐款8,800万美元。

农田改造

“1998年12月初WFP工作人员到项目区的时候，只有部分农田种上油菜、蔬菜和其他作物。大多数农田仍然是光秃秃的被水淹没。一个月后，到1月中旬，农田变成了一片绿洲。类似的重大变化还有灌溉水渠清除了淤泥，通往集市的道路修复开通。灾害发生后，灾民和政府都将维修住房和饮水系统作为头等大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实现这一目标。到春节，所有的灾民迁入修复或新建的房屋并且喝上了干净的饮用水。”

——刘伟 WFP中国项目助理



援助物资运输



撤出：理论依据

中国政府的减贫工作取得了许多世界上最杰出的粮食援助和发展的成果。长期以来，中国设计和实施项目的强大能力给WFP官员和认捐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成为扶贫典范的同时，其杰出表现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就是WFP的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已经不再是必需的。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成果开始使国际社会有理由相信中国具备了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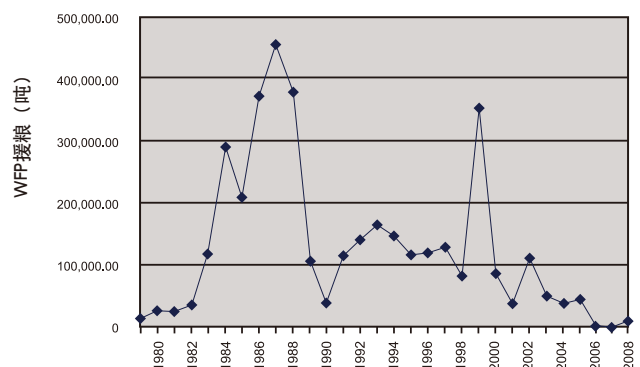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想法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因为许多捐助者认为WFP的比较优势在于为世界上的严重饥饿地区提供紧急援助。与此同时，WFP紧急援助相对于发展援助所占的资源份额开始上涨。

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有限的资源，WFP整合当时在中国的各个项目将其纳入一个国别规划。该国别规划成为WFP 2001年至2005年的收尾援助。该

框架采用多管齐下的策略，应对导致中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项目地区制约因素	WFP应对措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自然灾害频繁 · 市场可及性差 · 安全饮用水缺乏 · 卫生保健水平低 · 教育和培训机会有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土地开发和灌溉 · 水和土壤保护 · 社会基础设施 · 人力资本投资

1979—2008 WFP向中国提供的援助



在这五年期间，中国政府同意增加作为受援助国家的配套资金投入，支持WFP的项目所提供的资源。在最初协议的以1:1配合WFP资源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将其投入提升到2:1的比例。增加后的配套资金涵盖援粮在中国境内的运输、储存和管理的全部费用。中国政府还同意支付WFP粮食的海运费——这在WFP与受援国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

中国政府采取的所有这些额外举措在WFP的捐助方中获得广泛的支持，立即得到了WFP执行局的批准。

■ 可持续性

随着WFP开始逐步结束对中国的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确保可持续性有几个关键的方法。首先是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式增加受益人在项目设计阶段的参与。在90年代中期已经开展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生活用水的储存和保健中心，成为2001-2005年国别规划的第二个重点。除了帮助提高整体的可持续性，这些措施也减轻了受益者的，尤其是妇女的日常工作量。

然而，要确保可持续性，还要克服一些重大的障碍。主要灌溉系统升级、维护和运行所需重要投资必须由集体和农户承担，而不是像当时的情况由政府公共支出承担。此外，由水利部门负责的主要建筑物和跨区乡水渠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运转有序，但村组范围内的水渠因没有列入建设任务而搁浅。在许多情况下，这妨碍了灌溉系统发挥潜在的功效。

逐步撤出规划

“在交接方面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能力建设把项目移交给中国政府。我们不是仅仅把资源留下，而是要培训人员，留下一些知识。在逐步撤出计划中IFAD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有一些项目我们将离开，但IFAD将继续做下去。我认为IFAD在一些项目上与中国政府将继续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庄司百合子
WFP驻华副代表2001-2004年

培训在WFP的项目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有时教学方法和教授内容并不总是适合农民的教育水平、生活状况和实际需要，因而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农民还是从培训中获得了长远有用的知识。

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也仍然是一个挑战，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避免如盐渍化等环境威胁。



妇女参加参与式村级规划

宁夏受益人马耀林向采访者介绍自己的蓄水池



撤出：具体操作

中国国别规划框架下的项目接近尾声的同时，WFP援助的项目在其撤出后如何维持下去成为焦点。2000年完成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和环境恢复”项目是逐步撤出过程成功实施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案例。

该项目跨越三个县，目的是改善当地水土流失严重的现象。该地区春夏季严重干旱和秋季暴雨的极端气候是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整个项目由12个分项目组成，包括水利建设、功能性扫盲和技术培训。WFP援助的项目在该地区取得了效果，在其官方结束期限到来的时候，在中国政府的独立领导下，这些举措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和进一步发展。

■ 源源不断

一个针对改善饮水条件的分项目使项目区许多村庄受益。曹河的一个小社区是这一举措成功的典范。

在曹河新建的一座砖房里，33岁的万人美拧开房间角落的水龙头将自来水盛满了一只铁盆。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万大嫂却并不认为理所当然，因为自来水引入这个农村只是最近发生的事。不久前，村里妇女要步行三个小时打水——万大嫂至少每天两次走这个路程去打水，她的丈夫则忙于农耕或喂牛。在WFP的帮助下，村民可以通过村里的公共水龙头打水了。



万人美家中的自来水

WFP的项目完成后，中国政府延伸了饮水系统，将社区的公共水管直接接入村民家中，显著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比如，王大嫂因为有了便利的水资源，开始把自家的马铃薯做成面条，通过经营这个项目年收入约15,000元人民币，大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她家先前的泥稻草房子被现在的多间大瓦房取代。院子里原来有一间破棚子，如今停着一辆崭新蓝色拖拉机。

紧邻王大嫂的马秀英自豪地站在她那鲜花怒放的苹果园里，一家人围绕在她身边。她一边给大家展示她的新收成——一篮子红艳艳的苹果，一边感叹：“十年前这里没有花也没有果，什么都没有。”

■ 技术援助和植树造林

丰庄流域治理展示了这一项目一系列有益的农业特点，包括用于种植作物的梯田和保护水分的新植林区。



马秀英展示丰收的苹果

WFP项目完成后几年内，一个持续的焦点是如何为农民提供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必要技术和培训，如冬小麦。WFP离开该地区后，发展工作通过各个项目继续开展，其中包括种植药材以解决当地健康问题和将土豆加工成面条销售来创收。

黄湾流域一度是荒芜的群山，然而经过WFP的帮助，这里种满了涵养宝贵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的沙棘灌木。附近的森林种植兼有生态保护、经济作物和提供木材的综合目的。农民家庭在现金收入的激励下有足够的动力继续植树，这反过来更好的保护环境。

WFP的项目完成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继续推动新的作物品种，并培训农民更好的培育这些他们本不熟悉的庄稼。这样一来，每亩土地的收益增长了三倍。

■ 其他成功案例

仿效宁夏项目，国别规划下进行的其他项目也同样取得了可持续性和进一步发展的乐观成果。

同心县丁唐村里，39座混凝土内衬水箱取代了原来的泥土水库，并配备了沉淀池以过滤从六个抽水站抽出的黄河水。沿村庄主要街道还开挖了混凝土浇筑的灌溉水渠，使水直接流入村集体苹果园里，那是全村1,200名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35岁的马耀林和他同龄的妻子马淑伦看着自己的院子里的蓄水池完工后日益肥沃的土地都非常高兴。耀林自豪的宣布：“我们现在每亩土收入超过100元”。除了苹果树，这对夫妇也通过种植玉米、小麦和向日葵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像许多其他村民，他们用宽裕的资金建造了一所宽敞的新房子。

湖北恩施以工代赈修建的桥梁



经验总结

WFP在中国的近30年工作中，在这个逐步对外开放的国家里既遇到过困难也取得了成就。WFP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的关于发展援助的这些经验教训有利于将来其他项目的运作：

■ WFP的粮食援助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WFP在中国采用的方法和启动的项目被视为成功模式得以广泛推广，包括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和世界银行资助的华北黄土高原项目。此外，中国的一些地区，如贵州省安顺县，还利用自己的资源继续WFP的项目活动。

■ 政府的配套合作是综合扶贫方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各级政府成立了WFP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办公室，并提供政府配套资金以支持WFP援华项目实施。

■ 为有效地执行多层面的发展项目，在政府

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是非常必要的。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中国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构建有助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

■ 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使WFP项目更加成功。IFAD和WFP援助的联合项目为两个组织积累了宝贵的互补经验。许多项目也得益于其他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投入。

■ 受益者更深入地参与从设计、实施到完成的整个过程，对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积极影响。项目准备、规划和监测中引进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产生了更符合村民实际需要的积极成果。建立村实施小组和鼓励参与制定村级发展计划赋予全村人更大权利。重视妇女的作用以及使之参与项目活动被证明是成功的关键。

■ 通过以工代赈改良旱地和建造灌溉系统对保证家庭粮食安全有重要且持久的作用。生产力稳步提高和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为生产多样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农业收入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 以粮代教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要素，但孤立的培训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必须作为综合项目的一部分实施。长期努力，甚至项目结束后仍不间断培训是中国以粮代教活动成功的原因。

■ 干预措施覆盖过多社区和受益者证明并不能取得可持续效果。针对特定人群完成一个具体的任务能最好的利用资源。有限的资源过于分散时，农户无法从项目活动的规模效应中获益。

■ 深入的项目规划、系统的技术审查和评价考核是妥善实施项目，改进后续项目设计的关键手段。国别规划下中期评估相对减少，这表明在项目执行期间更需要这样的深入规划机制来调整战略和活动。

■ 对WFP进入收尾阶段的国别规划，应特别注意确保现行的发展项目以适当的方式逐步结束。开展后续活动和评估资源，只需要最少量的工作人员，但可以发挥确保可持续性和总结经验的宝贵作用。



广西粮食发放现场

中国通过WFP实施部分对外援助采取的方式之一是为紧急粮食短缺提供资金。资源紧张使WFP亟需对发展项目和救济行动的捐助。中国给WFP的及时捐赠不仅在短期内挽救了生命，还有助于这些面临粮食短缺的亚非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与发展。

通过WFP提供多边援助，中国政府可以确保其捐赠的使用效率和效果。WFP在受援国有运转良好的项目，可以参与整个评估，执行和监测阶段的工作。凭借对所在国的了解和经验，把资金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WFP执行中国的捐助保证了最大程度的透明和负责。

■ 从“体操王子”到“亲善大使”

奥运体操王子李宁2009年被任命为WFP反饥饿亲善大使，支持WFP的全球反饥饿工作。李宁在正式成为WFP大使之前已经对WFP在中国和海外的扶贫工作有所了解并感兴趣。他在2008年底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应邀前往南部非洲的莱索托王国，在那里参与了WFP的粮食分发工作，向当地母亲、孤儿和感染艾滋病毒者和结核病人分发中国政府捐赠的价值100万美元（约人民币689万元）的援助。

李宁说：“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懂得均衡的营养对于一个人的健康和成长有多么重要。作为一名父亲，我深知儿童需要我们的关心与支持。WFP为当地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所做的一切深深地感动了我。”

“1979年至2005年的26年间，WFP一直为中国贫穷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帮助，让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其他国家。”

李宁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和他对结束饥饿的强烈使命感，使他成为WFP在中国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 “行走天地间”始于中国

“行走天地间”这个全球最大的年度筹款活动是在中国迈出了它的第一步。

2003年，WFP的合作伙伴，TNT环球快递，在北京的长城脚下发起了这项活动。当时有TNT几百名员工及其亲朋参与。该活动在帮助提高对儿童饥饿问题的认识和筹募资源上十分成功，很快作为一个典范被推广到WFP和TNT所在其他国家，加强WFP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互动。

如今“行走天地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运动，2009年超过30万人在全球24个时区70多个国家参与了这项运动，为WFP在亚非的饥饿儿童提供的营养餐募集善款。



津巴布韦受益人领取中国捐赠的粮食



应对灾难

ZIM_200901_WFP-Richard_Lee_0007



中国捐赠给斯里兰卡海啸灾民的鱼罐头

中国对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深有体会，并对遭遇洪水、干旱或地震的其他国家慷慨解囊。

■ 2004年海啸

2004年12月26日，海底地震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海啸。地震导致的印度洋海啸淹没了大苏门答腊安达曼沿海社区，造成11个国家的20多万人死亡。受灾最重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和泰国。作为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海啸激发了广泛的人道主义热情。国际社会捐赠超过70亿美元帮助100多万流离失所者重建家园。

在免除斯里兰卡价值430万美元的债务的同时，中国政府答应为其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优惠信贷。中国政府还宣布通过联合国机构实施5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拨给WFP的100万美元。

中国援助斯里兰卡海啸灾民

“这种慷慨和及时的援助表明了中国跟正努力从天灾中复原的亚洲邻居同甘共苦的情谊。这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解决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的多边主义途径的承诺与日俱增。”

——詹姆斯·莫里斯 WFP执行干事 2002-2007年

“在国内取得空前的扶贫成果后，中国正跟WFP缔结一个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以消除饥饿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多米尼克·弗兰克福德
WFP驻华副代表2001-2005年



斯里兰卡东部受灾最重的安帕赖地区

中国的全部捐款都用来采购了鱼罐头，支持WFP在斯里兰卡重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以工代赈项目。以工代赈项目参与者重建损坏的公共设施，作为回报领到中国捐赠的罐头鱼以及大米、扁豆、糖和油组成的家庭口粮配给。在斯里兰卡人民从海啸中复原的能力重建中，通过与WFP密切合作，中国的捐赠达到了实现自力更生和可持续性的效果。

津巴布韦

2008年，中国政府承诺提供给津巴布韦政府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同年底，中国政府请WFP帮助实施这项捐赠。这是中国首次请WFP协助开展其双边援助。

由于津巴布韦粮食短缺严重，WFP迅速采取行动，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购买和分发工作。布拉瓦约、圭鲁、马绍纳兰、马旬戈和穆塔雷的70万受益者得到了7,000多吨玉米。



领到中国援粮的津巴布韦妇女



WFP项目官员刘梅、张琰与震区儿童

■ 2008年 四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遭遇了里氏8.0级地震，导致大约9万人丧生或失踪，15万人撤离家园。几乎所有的灾民都依靠中国政府以及包括WFP在内的国内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免费分发的食品维生。

中国政府三十年来第二次正式请求国际紧急救援，包括粮食援助。WFP的紧急粮食救援主要帮助解决灾民在震后初期的基本口粮需求，直到中国政府 and 红十字会能够定期提供粮食援助。

为了挽救和维持生命，WFP批准了一项50万美元的紧急行动，给绵阳、安县、平武县和江油市13.8万人在震后的三个星期里提供了方便食品。WFP分发的634.5吨食品中主要是方便面、大米、面粉和植物油。

WFP援助四川地震灾民

我国政府全力组织灾区救援和重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得到了联合国系统和外国政府的大力援助。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救援，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有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心，灾区许多生命得到了挽救。灾区人民会尽快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孙政才 中国农业部部长

WFP的中国籍国际员工迅速加入到赈灾工作中，其中刘梅和解洪义分别从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回国帮助开展救援。WFP和红十字会绵阳分部以及中国政府协作，给十几万丧失家园的灾民提供了食品包。此外，WFP中国办公室还派出工作组协助红十字会绵阳分会制定食品分配计划和设计口粮配给。



WFP项目官员解洪义与震区儿童



WFP筹款官员张琰协助红十字会工作

2006年“行走天地间”活动



结尾：展望未来

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历史时期，WFP从简陋的办公室起步，逐步壮大为对中国提供粮食援助最多的国际机构，在中国贫困地区成功实施了几十个项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占WFP全球最多的项目份额。

随着中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政府继续不懈努力消除农村贫困，并继承维护许多最初由WFP开创的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现在由当地政府管理，并继续发挥扶贫作用。

WFP在中国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正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带到世界各地。过去十年中，中国向WFP的项目提供了上千万美元，支持给那些像曾经的中国一样尚不能达到粮食自给的国家，为他们提供食品和发展援助。

随着世界越来越多地关注饥饿和贫困中人口，中国通过WFP给发展中国家的捐赠势必凸显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致力于与国际组织合作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诚意。令WFP感到自豪的是，她与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使三千万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鉴于双方三十年的成功合作历史，WFP希望与中国一道前进，为“无饥饿世界”的愿景成真共同努力！



缅甸纳吉斯风暴后食用高能饼干的受灾儿童

1979至2008年向WFP中国项目提供过捐助的国家和机构

(按英文首字母顺序)

- 阿根廷
-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 澳大利亚
- 奥地利
- 加拿大
- 联合国中央应急反应基金
- 中国
- 丹麦
- 欧盟
- 芬兰
- 法国
- 德国
- 爱尔兰
- 意大利
- 日本
- 荷兰
- 新西兰
- 挪威
- 沙特阿拉伯
- 瑞典
- 瑞典国际开发署
- 瑞士
- TNT
- 英国
- 美国



联合国
世界粮食
计划署
www.wfp.org.cn